2023年2月5日
星期日
中共衡阳市委员会主管
中共衡阳市委员会主办

# 文化周刊
CULTURE WEEKLY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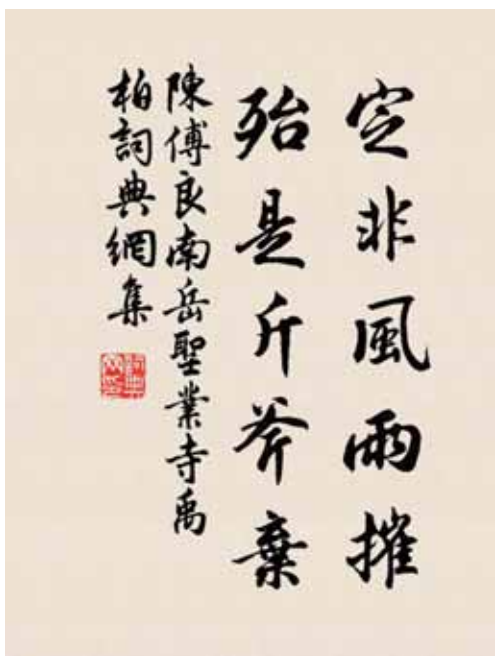
衡陽日報
HENGYANG DAILY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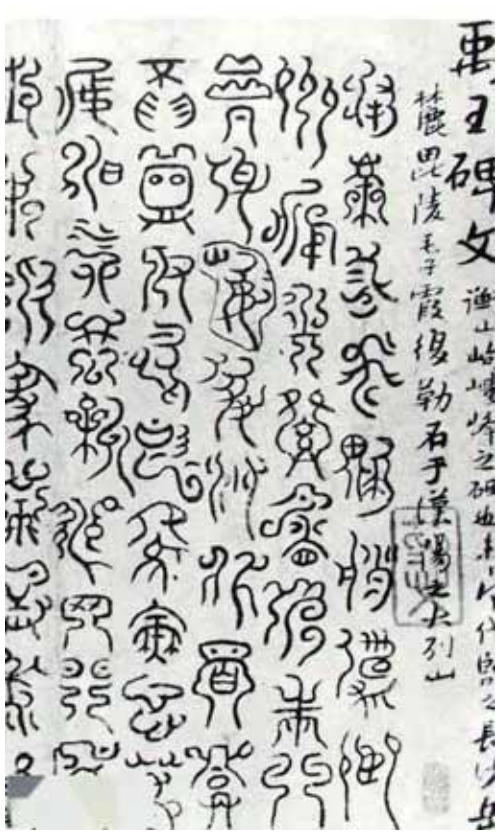
今日四版　农历癸卯年正月十五
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43-0004　第18423号
衡阳日报社出版

# 大禹加持衡山：风月4000年！（上）

南岳七十二峰人物

■廖和平



“茫茫九州，维禹甸之”。根据文献传说，夏禹治水、征三苗、巡狩时，曾数次南下江湘，多次到南岳衡山。作为上古杰出的政治家、水利专家和旅行家，大禹还开发了南岳衡山。

中国最早的地理著作《尚书·禹贡》称，禹导水疏河，从“岷山之阳，至于衡山；过九江，至于敷浅原（敷浅原一说为今庐山）。”

据《战国策·魏策》，魏武侯与诸大夫浮于西河，夸耀“河山之险，岂不亦信固哉。”军事家、西河郡守吴起不以为然，认为“河山之险，不足保也。”并说“昔者三苗之居，左彭蠡之波，右洞庭之水，文山在其北，而衡山在其南（西汉初年出版的《韩诗外传》有“当舜之时，有苗不服，其不服者，衡山在南，岐山在北，左洞庭之波，右彭蠡之水”句。岐山在今陕西岐山县境，衡山在今衡山县境。），恃此险也，为政不善，而禹放逐之。”

南岳衡山有“禹王碑”，因衡山古称“岣嵝”，又称“岣嵝碑”。东汉学者赵晔《吴越春秋·越王吴余外传》云：“禹登衡山，梦苍水使者，授金简玉字之书，得治水之要，刻石山之高处。”晋·罗含《湘中记》云：“岣嵝山有玉牒，禹按其文以治水，上有禹碑。”南朝·宋·道士徐灵期《南岳记》云：“云密峰有禹治水碑，皆蝌蚪文字。夏禹导山通渎，刻石名山之巅。”

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曾诗咏南岳禹王碑：

岣嵝山前神禹碑，字青石赤形模奇。
蝌蚪拳身薤叶披，鸾飘凤泊拏蛟螭。
事严迹秘鬼莫窥，道人独上偶见之。
我来咨嗟涕涟洏，千搜万索何处有？

唐代刘禹锡的《寄吕衡州》诗有：“传闻祝融峰，上有神禹铭”的诗句。南宋嘉定年间，文人何致将“禹王碑”摹刻于长沙岳麓山，得以流传于世。明末岳麓书院山长吴道行著《禹碑辨》：

考《吴越春秋》，载禹登衡山，梦苍水使者授金简玉字之书，得治水之要，刻石山之高处。此禹碑之所从来久矣。历千百年无传者，道士偶见之，韩文公、刘禹锡索之不得，致形之诗词。宋嘉定壬申（1212年），何致游南岳，遇樵者导引至碑所，始摹其文。过长沙，转刻之岳麓山顶，隐藏又三百馀年，至明嘉靖癸巳年（1533年），潘太守（镒）搜得之，剔土塌传，朝野始复睹虞夏之书。

禹王碑刻有77字，字体苍古难辨，有谓蝌蚪文，有谓鸟篆。末行空处有寸楷书“右帝禹制”。明代状元杨慎曾释碑文，其释文为：

“承帝曰咨：翼辅佐卿，洲诸与登，鸟兽之门。参身洪流，而明发尔兴。久旅忘家，宿岳麓庭，智营形折，心罔弗辰，往求平定，华岳泰衡，宗疏事衰，劳余神禋，郁塞昏徙，南渎衍亨。衣制食备，万国其宁。窜舞永奔！”

碑文大意是禹受命治水，日夜奔波于三山五岳之间，疏浚大川河流，最终治服洪水的功绩。

宋元以来，禹王碑被列为中国最早的碑刻，名曰“夏禹岣嵝碑”；周穆王“吉日癸巳”石刻（原刻于河北赞皇县坛山）列第二，名曰“周穆王坛山刻石”。衡阳石鼓书院、绍兴禹庙、南京栖霞山、西安碑林，以及开封、成都、昆明、武汉等地，皆有摹刻岳麓山禹王碑。传说大禹疏浚湘江时，曾在岳麓山开山凿路，后来麓山溪水沿禹凿山路汇成禹迹溪。（清）乾隆《岳麓山志》：“禹迹溪：溪在山口，距大江五里，大禹疏凿开山之径，上有拖船埠。”禹迹溪上山坳称拖船坳，亦名拖船埠，“民俗相传为禹王拖船过埠时，所遗留之痕迹。”《大清一统志·长沙府》载：“禹迹溪在湘江西岸，岳麓山左，一名大禹拖船坳，为神禹开凿之径。”

华容县南禹山。传说大禹治水时曾登其上，其与《禹贡》“东别为沱，又东至于澧”的地理背景吻合。禹山庙始建于西汉惠帝年间，历代均有修缮，唐肃宗曾登此庙祭祀大禹。明《华容县志·山水》载：“禹山，原名啸狮山，仰天长啸也。禹治水登其上，曰禹山，有禹王庙，有国祭。”（清）光绪《华容县志·山水》记载更为详细：“邑南三十里有禹山，禹治水登此，唐时山上有寺庙，建筑雄伟，前后三进，中殿供禹王菩萨，有国祭。明清两代以六月六日致祭。”

湘潭市区湘江与涟水汇合处，有一座赤紫色石山突兀屹立在湘江之中，人们称之为石嘴垴。《南迁录》记载，禹曾沉鼎于石嘴垴下陶公潭中，以镇水怪。

衡湘间传闻，舜帝崩于苍梧之野后，“夏禹及群臣诸侯来葬帝于何之九嶷山。”宁远玉琯岩旧有何侯宅，“传谓葬帝时，夏后与诸侯之所宿也。”（（清）王万澍：《湖南阳秋》，岳麓书社，2012年。）若据此说，夏禹奔丧路线应由洞庭湖溯湘水、潇水至九嶷山。

先秦时期，帝王巡狩征伐是国家的重要大事。大禹即帝位五年，清·王万澍《湖南阳秋》：“夏五月，王来巡狩于南岳，柴禋于六宗，望于南方山川，南诸侯朝王于玄堂。”传说，衡山县城的白马峰是大禹南巡时杀白马祭天的地方。明弘治《衡山县志》载：“白马峰，在县西，山海经云，昔大禹巡守至此，杀白马祭天，故名。”

湖湘学者蒋饷元研究表明，大禹巡狩南岳后，曾到九嶷山谒舜帝陵，并南巡苍梧。《吕氏春秋》有“禹济江南……南到计于苍梧”的记载。《荀子·大略》曾谓禹乘车外出，“过十室之邑必下。”《后汉书·陈蕃传》曰：“昔禹巡狩苍梧，见市杀人，下车而哭之曰：‘万方有罪，在予一人。’故其兴也勃焉。”《衡湘稽古》认为：“禹之苍梧也，以谒舜帝之陵。”可见，舜禹时期，湘水是中原王朝经营岭南的主要孔道，湘水河谷已辟有车马大道。

## 荆湘贡物及贡道

约公元前2070年，夏朝建立。作为上古三代的开端，制订的一系列法规制度为华夏文明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。其中，夏代制订的历法（又称夏历）是中国最早的历法，《禹刑》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刑典。

夏启在征伐有扈氏的甘（今陕西户县西）之战前，申明纪律约戒，要求参战者严格执行命令，否则予以惩罚：“用命，赏于祖；弗用命，戮于社，予则孥戮汝。”（《尚书·甘誓》）即所谓《甘誓》，这是古代最早的军法。

明·顾炎武《日知录》：“古来田赋之制，实始于禹。”大禹分封的诸侯，被征服或承认夏朝盟主地位的方国、部落，都要向夏都朝贡。天下九州的五服贡赋是夏王朝主要经济来源。夏王朝视各地物产确定贡物品种，根据交通道路的远近分作甸、侯、绥、要、荒“五服”。

甸服：距夏都五百里以内，即为天子服田役纳谷税、由君主直接管理的地区。百里之内者交带秸秆的谷物，一百里以外至二百里以内纳禾穗，二百里以外至三百里以内纳谷粒，三百里以外至四百里以内交纳粗米，四百里以外至五百里以内要交纳精米。

侯服：距夏都五百至一千里间，是夏后氏的诸侯领地。五百里至六百里为是卿大夫的采邑，六、七百里为男爵封地，八百至千里为诸侯国。

绥服：距夏都城一千至一千五百里，是夏朝势力所及的绥靖地区。其三百里内可推行教化，二百里外可发挥武威卫戍天子。

要服：距夏都城一千五百至二千里，是夏朝须通过结盟或交涉方式施加影响的区域。三百里内通过结盟和平相处，二百里外遵守条约。

荒服：距夏都城二千至二千五百里外，为未开化的疆域。三百里内的是各少数民族，二百里外进贡与否流动不定。

按照上述分类，衡湘地区大致在绥服和要服之间，夏王朝势力的边缘区域。根据文献记载和民间传说，夏禹的势力范围确曾涵盖洞庭湖区和湘水流域。

夏都曾多次迁移，先后达10多处。这些都城皆近黄河之滨，有舟楫之便，故贡道多沿水路，并形成以夏都为中心、以黄河为主干、交通九州的水上运输网络。

中国第一篇地理著作《禹贡》对九州的地域、河流、土壤、物产贡品及入贡路线等都有描述。其中：

冀州（河北平原与山西高原）是各州贡道必经之处，其入贡路线为夹右碣石入于河；

兖州（黄河与济水之间）：“浮于济、漯，通于河”；

青州（山东半岛）：“浮于汶，达于济”；

徐州（黄淮平原）：“浮于淮、泗，达于河”；

扬州（长江下游地区）：“沿于江海，达于淮泗”；

荆州（长江中游地区）：“浮于江、沱、潜、汉，逾于洛，至于南河”；

豫州（中原地区）：“浮于洛，达于河”；

梁州（秦岭以南、四川盆地）：“浮于潜，逾于沔，入于渭，乱于河”；

雍州（关中与陇西地区）：“浮于积石，至于龙门西河，会于渭、汭”。

关于荆州，《禹贡》记载：

荆及衡阳惟荆州。江、汉朝宗于海，九江孔殷，沱、潜既道，云土、梦作乂。厥土惟涂泥，厥田惟下中，厥赋上下。厥贡羽、毛、齿、革惟金三品，杶、干、栝、柏，砺、砥、砮、丹，惟菌簵、楛。三邦底贡厥名，包匭菁茅，厥篚玄纁玑组。九江纳锡大龟。浮于江、沱、潜、汉，逾于洛，至于南河。

大意是：荆州北据荆山，南及衡山之阳。长江、汉水东流入海，多条河流集注洞庭湖，沱水、潜水疏通以后，云梦地区已可耕作。那里土壤潮湿，田属第八等，赋税属第三等。那里的贡物是羽毛、旄牛尾、象牙、犀皮和金、银、铜，椿树、柘树、桧树、柏树、粗磨石、细磨石、石矢镞、丹砂和美竹、楛木。三个邦国进贡茶茗，包裹好的菁茅（《括地志》：“辰州卢溪县西南三百五十里有包茅山。”），装筐的玄纁和珠串。洞庭湖一带还奉命贡大龟。《史记·夏本纪》：“九江入赐大龟。”集解孔安国曰：“尺二寸曰大龟，出於九江水中。龟不常用，赐命而纳之。”这些贡品经长江、沱水、潜水、汉水，又改走陆路到洛水，再到黄河。

关于荆州的地域，清代地理学家胡渭（1633—1714）则认为：以今舆地言之，湖广武昌、汉阳、安陆、荆州、岳州、长沙、衡州、常德、辰州、宝庆、永州十一府，郴、靖二州，施州卫，其襄阳府则唯南漳县，德安府则安陆、云梦、孝感、应城、应山及随州之南境废光化地，黄州府则黄冈、麻城、黄陂、黄安，四川则夔州府之建始，广西则桂林府之全州，皆古荆州域也。（胡渭：《禹贡锥指》卷七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6年）

风雅石鼓

# 南宋抗元名臣李芾的祭祀建筑——李忠节公祠

■刘　洁

上期说过，书院不仅有教育功能，更有祭祀功能。宋代著名诗人范成大登临石鼓书院时，就有诗云：“俎豆弥文肃，衣冠盛事多”，可见当时的石鼓书院的祭祀活动之多。书院祭祀先师先贤，不仅是纪念这个人，还要传承他的学问和精神。同时书院与现在的大学所不同的是其社会性。大多书院是民办的，也有官助民办的。石鼓书院在初创之时是私学，宋代有段时间是州学（官学），其后大多时期是官助民办。社会性的书院除了教育诸学子之外，同时也承担教化社会民众的作用。所以，在书院中祭祀的先贤，除了教育先师外，同时也有这座城市人民所需要共同纪念的先贤，需要共同传承的精神。石鼓书院所祭祀是一群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”的以天下为己任的湖湘文化的先师先贤，弘扬的是一腔热血、忠心报国的中华民族精神。

2007年重修石鼓书院时，在武侯祠的右边并排建造的是祭祀南宋抗元名臣李芾的李忠节公祠。李芾祖籍河北广平人，后迁入京城开封。其高祖李升进士出身，为官清廉。北宋被金灭亡时，在靖康之变中，李升顽强抵抗，被金人所杀。随后李芾15岁的曾祖父李椿举家南迁到了衡阳。到李芾这代在衡阳已经有百余年。李芾出生于衡阳，自幼深受祖风熏陶。他生性聪颖，从小立有报国大志，并为自己的书斋取名“无暴弃”。后南宋理学家魏了翁见之有祖风，为其改为“肯斋”。

李芾因祖上有荫功入仕，历任南安司户、祁阳知县、临安府尹、湖南提刑、湖南安抚使兼湘潭知县。李芾为官刚正不阿，不畏强暴权贵，在官场上几经沉浮。宋史评价他“为人刚介，不畏强御，奸猾不能欺……望之凛然犹神明，而好贤礼士……平生居官廉，家无余赀”。李芾精力过人，尽忠职守，常常是早上办公到夜晚而无倦意。夜里三更天才去休息，五更天又起来公务。

1273年，蒙古大军大举南下，势如破竹。在元军“屠城令”的威慑下，沿途州县纷纷望风而降。元军顺汉水长驱东下，强渡长江，南下直逼湖南。1275年3月，元军攻下岳州。4月江陵沦陷，常德、鼎州、澧州出降。随即，元军继续南下围攻潭州（长沙）。此时的李芾被罢官在衡阳老家。国家危难之时，被朝廷重新启用任谭州知府兼湖南安抚使。朋友们都劝李芾不要去任命，可李芾说：“第以世受国恩，今幸用我，我以家许国矣。”身边朋友闻之无不感动涕零。赴任前，李芾的一个女儿不幸病死，他强忍心中悲痛，毅然前往，携家眷从衡阳抵达潭州城。到达潭州，他也知潭州守不住，于是含泪遣送幼子裕孙携族谱出城，说：“保存汝以祭祀。”而他自己和其他家人则做好了与城共存亡的决心。

李芾7月赶到潭州后，紧急招募了3000人，又亲自劝说当地的一些有名望的大族乡绅一起守城。9月，元朝右丞相阿里海牙率领数万元军将潭州城围了个水泄不通。李芾登上城楼冒着箭石亲自督战，率领军民苦守三个多月。无奈寡不敌众，南宋大势已去，城中弹尽粮绝，三月中无任何一支宋朝部队过来救援。宋史中描述“死伤相藉，人犹饮血乘城殊死战。”

除夕之夜，元兵登上了潭州城门，如蚂蚁般蜂拥而至，附墙而登，城已破。李芾的幕僚曾任衡州太守的尹谷得知元兵已登城，说：“吾以寒儒受国恩，典方州，谊不可屈，若辈必当从吾已耳”。于是全家人坐在一起举火自焚。李芾闻讯赶到，以酒祭奠，感叹道：“务实真男子也，先我就义矣！”务实是尹谷的号。

当晚，李芾亲自书写“尽忠”作为号令。并召来部下沈忠，对他说：“吾力竭，分当死，吾家人亦不可辱于俘，汝尽杀之，而后杀我。”沈忠伏地叩头痛哭，喋血满地，说万万不可。李芾毅然决绝命令他执行，沈忠只好哭着答应。于是李芾命家人取酒过来，让全家19口人都喝醉，然后沈忠一一杀死。之后放火烧毁李芾官衙熊湘阁，成全了李芾“我以家许国矣”的天地承诺。

沈忠杀了李芾全家后，回家杀了自己的妻子和两个儿子。又返回到熊湘阁自杀身亡。李芾的许多幕僚也都举家自尽。长沙城里许多百姓听说李芾壮烈而死，都效仿而行。据记载，当时长沙城内无虚井，缢死林木者相望。长沙军民在抗元斗争中演出了极悲壮的一幕，虽以失败告终，但李芾的精神和气节，唤醒湖南人的血性，激励一代又一代湖湘子弟，用生命捍卫自己的信仰，用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救国家民族于危难之际。李芾死后，南宋朝廷赠李芾端明殿大学士，谥号“忠节”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此时在潭州城外的岳麓书院的山长就是前面所说的尹谷。尹谷入城抗敌时，劝说书院学生逃离。他动情地说：“斯文不绝，则华夏不亡。望诸君能传一盏灯，延续华夏文脉，以待再次光大。”然后与学生作别。无奈学生们并未离开，而是跟随老师进城抗敌。潭州城破之日，几百名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，和敌人殊死搏斗，几乎全部慷慨就义，余者也追随老师而去，自杀殉国。学生们不能像武将奋勇杀敌，但文人的精气神，是一个国家脊梁。正是有这种光辉的延续，才保存了中国的民族文化和精神。

李芾死后一年，南宋著名诗人画家郑思肖作诗追念《咏制置李公芾》：

举家自杀尽忠臣，仰面青天哭断云。听得北人歌里唱，潭州城是铁州城。

元军之后的南下战斗中，再未遇到如此激烈的抵抗。

1329年，衡阳人在李芾的故居旁边兴建了李忠节公祠，并以沈忠、穆演祖配祀。穆演祖曾任衡阳尉，公元1271年曾击退元军，保全衡阳。李芾对他很是赏识，升其为衡阳知县。李忠节公祠后移祠石鼓书院，与武侯祠并列。

1373年，明朝初年著名诗人和画家杨基路过衡阳，祭拜李忠节公祠后，回到船中仍悲痛不已，作七律诗《哭李太守芾》：

丁卯科中第一人，誓将孤壁障妖尘。
百年事业归儒者，万里江山泣老臣。
肝胆当时肇余阙，英灵此日配张巡。
我来竟就船头拜，一盏寒泉荐绿苹。

李忠节公祠。■石鼓书院供图

明朝成化年间监察御史薛纲，官至云南布政使，广东按察使。路过衡阳拜祭李芾，作《吊李忠节公祠》：

慷慨杀身随处有，潭州惨烈更谁同。
千金首共孤城碎，数口家随巨焰空。
从死一时皆义士，败降诸郡尽夷风。
古今多少英雄泪，半哭明公半沈忠。

南宋末年，文人武士多以身殉国。崖山一战就十万之众集体跳海身亡，不由令人唏嘘。一部南宋史，一把辛酸泪。

现在的李忠节公祠上依然是清朝中兴名臣彭玉麟的题联：

义烈炳潭州，千秋英名垂竹帛；崇祠仍故宅，一龛清供有梅花。